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524.001

# 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 张治银 董大伟 王 娟

中央团校:党的青年运动史教研部;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北京 100089

**【摘要】**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关键词】**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 建党准备 历史考察

五四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拉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序幕。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sup>[1]</sup>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创办社团,尝试组织起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 一、组织准备:由一盘散沙到主张创办新式政党

民国初年,中国约有312个政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sup>[2]</sup>。这些政党结党谋私,相互倾轧。正如李大钊所述:“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sup>[3]</sup>民国初年政党的种种行为于人民群众利益毫无益处,甚至伤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致使社会滋生出厌恶政党政治的情绪。“不党主义”蔓延,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中国仍旧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状态。要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

收稿日期:2023-03-02

作者简介:张治银,中央团校党的青年运动史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董大伟,中央团校党的青年运动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党的青年运动史;

王娟,中央团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副主任,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编号:2019MZD017)、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从认知到信仰: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的机理研究”(课题编号:21TZTSKB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须继续寻找新的领导力量。李大钊说：“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sup>[4]</sup>基于对政党政治的排斥，当时的先进分子创办了各种研究会、所、社等社团组织。这些社团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但对中国新式政党的建立起了很好的催化作用。

制订组织章程。一是提出社团宗旨。组织章程的灵魂为宗旨。五四时期的社团多在章程开篇即亮明了自己的宗旨。新民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sup>[5]</sup>。觉悟社宗旨为“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sup>[6]</sup>。互助社宗旨为“群策群力自助助人”<sup>[7]</sup>。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为“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sup>[8]</sup>。国民杂志社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新知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sup>[9]</sup>。其宗旨表明了创办社团组织的目标。二是明确组织架构。少年中国学会总会设于北京，各省有5人以上设立分会。学会机关分“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评议部履行议决监督会务、审查预算等权力。执行部设“总务、交际、调查、会计、庶务”等五股。编译部综理编译事务<sup>[10]</sup>。组织架构的明确保障了社团组织的运行。三是规范成员行为标准和加入程序。互助社要求成员做到“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sup>[11]</sup>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要求入会需要有介绍人，且需要对照会员标准进行严格评议。比如成为新民学会会员基本程序是“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sup>[12]</sup>。对组织成员提出严格要求，有助于保持成员的先进属性。四是明确组织纪律。新民学会规定有“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对于本会无感情”“毫无向上之要求”“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等情形，“不再认其为会员”<sup>[13]</sup>。明确组织纪律，有助于锻造更有凝聚力的组织。虽然众多社团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纲领，但其章程无不是以改变中国现状为根本目标的，对于当时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具有进步意义。

训练组织骨干。先进组织必有强有力的骨干和灵魂人物。五四时期的社团十分注重骨干力量的培养。一是在组织联络工作中培养骨干。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毛泽东被推选为干事，负责起草学会章程。毛泽东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联络组织湖南籍青年在北京大学、保定、蠡县、长辛店机车厂等地举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湖南学生总罢课。在毛泽东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短短一月之内，湖南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发展到四百多个<sup>[14]</sup>。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带领湖南青年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新民学会系列组织联络工作培养了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李维汉、何叔衡、谢觉哉、张昆弟、罗学瓚、郭亮、夏曦、易礼容、蔡畅、熊瑾玎等骨干，其中大部分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代表。二是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培养骨干。1919年3月，邓中夏、廖书仓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每月举行4次定期讲演，有重大事件发生或节假日举行不定期讲演<sup>[15]</sup>。讲演团举办的系列讲演活动培养了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周炳琳、易克嶷、黄日葵等骨干力量。五四运动中许德珩、黄日葵被派往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等地参与“呼吁一致行动”<sup>[16]</sup>，对发动全国学生参与五四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时期先进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组织成立社团，参加爱国运动，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也在实践中促进了自身的成长和进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新民学会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互助社的恽代英、林育南，觉悟社的周恩来、马俊，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邓中夏，少年学会的赵世炎，少年中国学会的刘仁静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党员多是由五四时期的社团成员转化而来。

增进组织团结。一是促进相互熟悉。结成一个牢固的团体，首要的是相互熟悉。互助社提出“社会的事业要最能彼此了解的一些人才能做下去”<sup>[17]</sup>。为了促进成员尽快熟悉起来，互

助社将新社员“分入旧社员与他相熟习的一组,或使自成一组而派一旧社员去帮助他”<sup>[18]</sup>。新社员入社一段时间后,互助社再安排各组社员交换列席会议。互助社还安排社员教八段锦,组织参观成员家庭,违背社团戒约的成员需缴纳罚款,组织社员每周日郊游。在系列文体活动中成员之间增进了了解和认识。二是开展严格的组织生活。互助社社员每日开会一次,会议时长约一小时,主要讨论社员得失——“社员必各自订一作事之日程,未能遵守日程之作事,必报告其理由,而同人互评判之。”<sup>[19]</sup>开会之前静坐5分钟,会议结束朗诵《互励文》。三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上登载了赴法勤工俭学会员的个性批评与介绍:“(和森)坚强,防僻。(焜甫)须去寒士气。(赞周)分析力强,须防无条理。(子璋)活泼有孩气。(芝圃)严正,防简单。(和笙)精细。(荣熙)宽厚,而官能欠灵动。(子升)周到有条理,防狭隘。(警予)温良,防躁急。(季光)从容不迫。(叔彬)自信力强,欠灵动。(咸熙)颇强固。(玉山)温和,但有女性。”<sup>[20]</sup>在通信中还强调学会要发展会员个性的极强处、补救会员个性的弱处,一些增进组织团结的方式方法,严格的组织生活,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依然为我们今天所沿用。

主张组建新式政党。一是组建以国民为依靠的政党。1919年,陈独秀提出:“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sup>[21]</sup>陈独秀主张组建真正以国民为依靠的政党,以替代结党营私的旧式政党。二是要组建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sup>[22]</sup>三是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步骤。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骤是:“(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sup>[23]</sup>四是列出入党条件。1920年9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介绍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入党条件为:“(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认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sup>[24]</sup>1920年下半年,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人民就有了团结奋斗的主心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是在青年时代就满怀信仰和豪情加入了党组织,并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sup>[25]</sup>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加入党组织,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不懈奋斗。

## 二、力量准备:由少数人参与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历次救国方案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最大多数人的力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的领导者们没有与人民群众充分结合。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但这不过是遁世避祸的代名词,不可能也不准备真正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宣传教育群众,组

织动员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sup>[26]</sup>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最为广泛的革命力量。

树立正确群众意识。一是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根据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五四运动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sup>[27]</sup>上海轮船公司工人罢工，让全市水上交通陷于瘫痪。北洋政府获悉上海电厂、水厂工人即将罢工的消息，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在运动中感受到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二是发自内心尊重群众。五四运动之前，文化阵地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能够上大学的多是地主阶级的弟子。在工农群众眼里，这些大学生毕业后是要“当官做老爷”，要来统治工农群众的。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林育南曾对张浩说：“我们这些人靠着父亲赚些黑心钱来念书，吃好的喝好的，过寄生虫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下等人呢！你们做工，从小处说是自食其力，从大处说，社会就非有你们不可，你们才真正是上等人呢！”<sup>[28]</sup>受了林育南等人的鼓舞，张浩转变了做工低贱的观念，转而以做工为荣，到上海做工去了。三是主张民众大联合。1919年7月毛泽东提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sup>[29]</sup>他主张联合各行业、各职业的民众，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对付真正的敌人。

教育服务群众。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服务群众很重要的方式是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和生活常识。一是普及文化知识。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机车厂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和常识等。邓中夏说：“教工人读书识字还是重要的”“不识字没有工具，对接受新思想是一个大阻碍”<sup>[30]</sup>。邓中夏指定人编写课本，将工人日常用的钳、锤、锉、锯等工具编入教材。二是普及卫生常识。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4月到1922年3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宣讲卫生常识17场次，其中宣讲主题有“寄生虫”“吐痰不入盂的害处”“纸烟的害处及其戒法”“肺病”等。三是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到1923年4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宣讲自然科学知识13场次，其中宣讲主题有“空气”“植物对于人生之利益”“日蚀月蚀之缘故”“地球的来历”“太阳多大呢？”“土的来历”“雪怎样来的？”“刮风的缘故”等。四是普及家庭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到1922年5月，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宣讲家庭教育、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知识22场次，其中宣讲主题有“怎么做家长”“早婚之原因及恶果”“打破旧式的婚姻”“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缠足的害处”“女子擦粉真好看吗？”“怎样教养儿童？”<sup>[31]</sup>等。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常识的普及，满足了群众基本的文化需求，为组织动员群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鼓动群众。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重视群众宣传工作。一是创办宣传阵地。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大量刊物，撰写发表大量文章；相关刊物成为传播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他们到长辛店机车厂附近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白天给工人的孩子上课，晚上给工人上课；劳动补习学校实际成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培训学校。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在北京城东南西北四城讲演所定期讲演，还深入到北京郊区和农村演讲，构建起一个个临时的宣讲阵地。二是精选宣传内容。起初宣讲内容以政治常识为主。1919年6月1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邀请周显政讲“为什么要爱国”，邀请田奇璜讲“民与国的关系”<sup>[32]</sup>。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宣传内容逐渐转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1920年沈玄庐在工人通俗读物《劳动界》发表文章阐释剩余价值：“为什么布、米、砖头、瓦片，会值钱呢？因为是人工做出来的。值价钱的不是东西底本身，是劳动者底工作。”<sup>[33]</sup>由此可见，相关文章已经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三是创新宣传形式。长辛

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师给工人讲唯物史观,不是空洞地念诵马克思主义词句,而是用工人熟悉的事物讲原理。教师拿一张白纸,让工人用指头戳,一戳就破;教师拿一大叠纸,又让工人用指头戳,指头戳痛了也没戳破。教师说:“一张纸一戳就破,可是一叠纸用拳头打都打不破,我们工人也是一样,五人团结赛老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枪炮也没有办法。”<sup>[34]</sup>“团结”这个道理就牢牢地扎在了工人心底。

组织凝聚群众。发动群众首先要有号召群众的中心。一是创办群众组织。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创办了学生救国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等联系青年学生的组织,创办了商学联合会、商学工报联合会等联系社会各界的群众组织。蔡和森提出在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再创办工团、合作社等联系服务群众的组织。李达提出:“劳动组合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劳动者在这学校里和资本阶级争斗,其结果要达到社会主义,只有劳动组合能够造成真的劳动阶级的党派,能使劳动者的势力抵抗资本家的势力。”<sup>[35]</sup>李达这里讲的劳动组合即工人的组织——工会。二是发起群众运动。五四运动期间,先进青年密切联系各界群众,发起了形式多样的群众运动。为了唤起工商界群众抵制日货、罢工罢市,天津各界联合会组建了跪哭团。调查发现偷销日货的商号后,跪哭团将商号执事人围绕在中间,“跪倒地下悲痛号啕地大哭起来,其悲戚惨痛的情景比灵棚吊孝还哀伤,叫人闻之心酸。”<sup>[36]</sup>跪哭团团员一边哭泣劝告,一边“历述亡国灭种的残酷遭遇”,有力地教育了奸商。这些群众组织的成立和群众运动的开展,对于推动五四运动向前发展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 三、思想准备:由情感结合到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由于思想和实践的局限,五四时期社团起初多以趣味相投的少数人为基础组建而成,具有浓厚的情感基础。在团体规模小时,情感的结合能起到粘合纽带作用。当团体达到一定规模,情感的联络效能会逐步递减,就需要让位于“主义”。这种客观需要加剧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流行。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先进青年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历经三大论战和现实检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宣告破产,越来越多的先进青年逐步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各种方案和“主义”破产。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复杂性和社会思潮的多样性,五四时期的青年不可避免地受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政治学说的影响。但是经过现实的检验,形形色色的方案和“主义”逐步破产。一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推行“三民主义”。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皇帝,但中国广大的农村仍然处在封建势力的统治之下。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无数先烈的鲜血告诉国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采用兴办教育、兴办实业等和平的方式走进未来美好社会,一度吸引了众多青年参与。然而,残酷的现实教育广大青年,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江西改造社成员发表文章指出,“缓进派”主张教育救国,但拿不出“大宗的款子”来振兴教育,连“固有的一点教育经费尚且保不住”“固有的几个学校”都要关门;主张文化救国,但文化做不到使“现在的军阀不专横”“政客不捣乱”“列强不侵掠”;主张实业救国,但由于“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侵掠下,经济权完全操在外人手里”,中国的实业毫无“振兴的希望”;主张人格救国,“率一群饥无食、寒无衣的人”,向“一群良心丧尽、血的温度在冰点以下的军阀、官僚、议员、政客谈人格”,只会“为他们所暗笑”。可见,“所谓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实业救国以至基督教徒所谓人格救国,都是空话,都不足以救目前

的中国。”<sup>[37]</sup>1920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说,希望用和平手段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sup>[38]</sup>种种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三是无政府主义的破产。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于政治上则蕲无政府之组织,于经济上则主张共产之真理。”<sup>[39]</sup>展开来说就是主张“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平等。”<sup>[40]</sup>正如茅盾所说:“那时又因种种运动的失望,对于国家制度底本身,也发生了绝大的怀疑,所谓无政府主义,也很流行起来了。先前大家都提倡爱国,到了这时,连什么国家,什么政府都不要了。”<sup>[41]</sup>由于对当时现实中的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失望,无政府主义吸引了众多青年。蔡和森说:“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sup>[42]</sup>。残酷的现实使得无政府主义组织很快销声匿迹。五四时期的青年放弃其它种种方案和“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迫于当时中国现实环境作出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sup>[43]</sup>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马克思主义受到中国青年的广泛关注。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1918年7月、11月、12月李大钊分别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称赞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要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今后的世界将是“劳工的世界”;“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44]</sup>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介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五四运动中,先进青年走向工厂街头、走向田间地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奠定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基础。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到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三是三大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等三大论战澄清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认识,促使广大青年由信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转向信奉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更为广泛的传播。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毛泽东等一批先进青年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书信中写道:“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sup>[45]</sup>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主义”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仰和“主义”,而是明确指向马克思主义了。四是阶级斗争逐渐成为青年的共识。1919年李大钊说:“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sup>[46]</sup>这实际上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1920年陈独秀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sup>[47]</sup>1920年蔡和森列出达到未来美好社会的公式:“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sup>[48]</sup>他认为要达到消灭阶级的目标,“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方法。”<sup>[49]</sup>阶级斗争取得胜利后,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过渡到未来美好社会去。这一思想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之中:“本党纲领如下:(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sup>[50]</sup>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总的来说,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组建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sup>[51]</sup>。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创办的各种社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锻炼了队伍、培养了骨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五四运动与以往历次救国运动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并前所未有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找到了一条与群众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服务人民群众的过程中转变认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五四时期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在新时代仍需要 we 们继续传承和发扬。

### [ 参 考 文 献 ]

-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 [2] 杨德山:《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 [3][4]《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0页。
- [5][7][8][10][11][12][13][17][18][19][20][40] 张允候 殷叙彝 洪清祥 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18、224、227-228、118-119、20、11、136、120、123、43、102页。
- [6][9][15][30][31][32][34] 张允候 殷叙彝 洪清祥 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03、19、139、262、142-181、152、264页。
-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 [16]《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页。
- [21]《陈独秀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5-366页。
- [22][23][24][42][48][49]《蔡和森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5、74、57、68、76页。
- [25][26][51]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13、207、206页。
- [27] 刘明远:《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页。
- [29][4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497-498页。
- [33] 玄 庐:《价值和公道》,载《劳动界》,1920年9月26日。
- [35]《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38页。
- [36]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五四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154页。
- [37] 张允候 殷叙彝 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87-288页。
- [38]《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 [39] 凌 霜:《弁言》,载《自由录》,1917年第1集。
- [41] 沈雁冰:《五四运动与青年们底思想》,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11日。
- [4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 [44][46]《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355页。
- [47]《陈独秀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 [5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责任编辑:韩永涛)